

西窗集

夏尔·波德莱尔等著
卞之琳译



大家经典书系

卞之琳系列

APG 安徽出版集团
安徽教育出版社

夏尔·波德莱尔等 著
卞之琳 译

西窗集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窗集 / (法)波德莱尔等著; 卞之琳译.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7. 4

(大家经典书系. 卞之琳系列)

ISBN 978-7-5336-3716-3

I. 西… II. ①波…②卞…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0592 号

责任编辑: 万直纯

出版发行: 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合肥市回龙桥路 1 号

邮 编: 230063

网 址: <http://www.a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合肥义兴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650 mm×960 mm 1/16

印 张: 10.25

字 数: 120 000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2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 000

定 价: 15.5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我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电 话: (0551)2823297 2846176

目 录

译者总序	1
修订版译者引言	9
初版译者题记	13

第一辑 散文诗四篇

〔法国〕夏尔·波德莱尔

时 钟	14
-----------	----

〔法国〕斯特凡·玛拉美

秋天的哀怨	16
-------------	----

冬天的颤抖	17
-------------	----

〔法国〕保尔·瓦雷里

年轻的母亲	19
-------------	----

第二辑 保尔·福尔：亨利第三

〔法国〕保尔·福尔

亨利第三	21
------------	----

第三辑 莱奈·玛丽亚·里尔克:旗手

[奥地利]莱奈·玛丽亚·里尔克

旗 手 33

第四辑 洛庚·史密士:小品(二十篇)

[英国]洛庚·史密士

小品(二十篇) 44

第五辑 阿索林小集

[西班牙]阿索林

《小哲学家自白》九章 54

《村镇》一章 63

《堂胡安》八章 67

《菲利克思·瓦迦士》二章 79

《蓝白集》七篇 83

第六辑 长篇小说两章(节)

[法国]玛瑟尔·普鲁斯特

《史万家一边》第一段 114

[法国]安德雷·纪德

《赝币制造者》第一部第二章 120

第七辑 短篇小说三篇

[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

爱芙林 133

〔英国〕维吉妮亚·伍尔孚

在果园里 139

〔法国〕阿尔培·阿克雷芒

无话的戏剧 142

附录 福尔的《亨利第三》和里尔克的《旗手》 146

译者总序

我从事文学翻译，不是遵循什么翻译理论指导开始的；要讲自己的文学翻译实践，则是60年的道路好像兜了一圈；始于译诗（韵文），中间以译散文（包括小说）为主，又终于译诗（韵文，包括诗剧）。

具体经历是：1928年我在上海当时以数理教学著称的浦东中学读高二年级，居然有一门莎士比亚课可选修，大约就只一学期，我就在班上读了一本《威尼斯商人》原文。课外，我自读了英国浪漫派诗人柯尔律治（S. T. Coleridge）的叙事名诗《古舟子咏》，为满足自己文学创作的替代乐趣，就悄悄把全诗译出，全长1060行，行对行，韵对韵，自我约束极严。

当时我还远没有了解中国新诗即语体诗，要讲均齐，各行节奏单位（格）不宜用单音汉字数计算（后来才逐渐掌握以音组或顿、拍作为各行衡量尺度及其参差变化规律，自由体当然可以不拘，但也应有此语言节奏及其变化轨迹感）。当时我常犯“土音（吴音）入韵”（朱湘批评徐志摩诗用语）这种毛病（这在我后期诗创作与翻译中时或难免），也不注意分辨原诗阴、阳韵及其在翻译中尽可能设法与之相应。全诗译出了，呆板可知，结果自己以全部作废为快。

1929年暑假后我只身北上进北京大学，在浦口换火车，恰巧换到

和同车厢也初次去北平上清华大学的钱锺书对座，他旁边坐的是他的亲戚高昌运，已是北京大学二年级学生了。几十年后钱还记得（我自己忘了），笑说我当时手头带了一本赵元任译路易士·卡洛尔（Lewis Carroll）儿童文学名著《阿丽丝漫游奇境记》（或《镜中世界》？）。可见我当年对文学翻译的癖好。

我开始在北京大学读英文系。在一年级英诗课上，一位美籍兼课女教师用陈旧而仍通行的《英诗金库》作为我们的教本，主要选讲其中后几辑英诗，亦即 19 世纪浪漫派及其殿军维多利亚时代诗。我在堂下就随手选译了所听讲到的一大部分，仍像在中学时代译《古舟子咏》一样严格依样画葫芦，也乐于随译随扔，同时在系主任温源宁亲授的一年级莎士比亚课上读了《仲夏夜梦》。也就自己以严格的形式相应的要求下，曾在课余，一鼓作气，通译了一道，随即毁弃。

1930 年秋冬间我试写了一首自由诗，和稍后译的爱尔兰戏剧家约翰·沁孤（辛）一首格律体短诗，先后投寄给杨晦编的《华北日报副刊》，于当年 11 月和次年元月先后发表了。这就标志了我文学创作与翻译的正式同步开始。

当时在班上从一位瑞士籍兼课教师学了一年第二外国语法文课以后，居然能从原文自读波德莱尔开始的法国象征派诗了。到 1931 年徐志摩从上海回北京大学教我二年级英诗课，在班上主要漫谈雪莱诗的时候，我的读西诗兴趣，已经从英国浪漫派方面转到法国象征派方面。他把我一些习作诗带去上海给《诗刊》等刊物发表，也把我译的玛拉美短诗《太息》发表在《诗刊》第 3 期上，那就是道地象征派诗了。（这也可见徐志摩、闻一多以及叶公超编《新月》等刊物的时候，在诗艺方面都襟怀宽广、不拘一格。）

1933 年大学毕业后，我不愿再接受考试，例如考公费出国留学，拟以文学翻译为职业来维系文学创作生活，只缘同年在清华大学毕业的

朋友万家宝(当时已写了《雷雨》还没有发表的曹禺)去保定育德中学教了一、二星期高中三班英文课,就称病回北平,拉我去代他的教职,不得已去代了他,薪高课也重,堂下改每周一次作文卷,又不肯马虎,身体可真顶不住了,到寒假结束,就干脆辞职回北平,从此就开始文学翻译生涯。

写诗不能想写就写,译诗材料现成,但也总是字数少,翻译报酬也就有限,我开始经常为杨振声、沈从文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艺版译零星文字,主要就是英美及东西欧现代散文,都可称“美文”的散文诗、散文小品、随笔、短篇小说,也译过维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一篇评论文,译题为《论英国人读俄国小说》,也曾给《新月》杂志从哈罗尔德·尼柯孙(Harold Nicolson)研究魏尔伦的一本专著中译出了一章中的三节,加题为《魏尔伦与象征主义》,并选译波德莱尔诗十首(《恶之华零拾》),1934年上半年应叶公超命给《学文》创刊号译载艾略特的著名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也曾为林语堂主编《人间世》;译过马丁(E. M. Martin)的随笔《道旁的智慧》。都是用我译诗的要求来译散文,不限于“美文”,特别在句次字序上力求紧贴原文。

也就这样开始了译整书。1934年秋后,我协助靳以执编《文学季刊》,分工主管附属创作月刊《水星》,从出版月刊的文华书局领一点微薄的编辑费,接着承也在北京大学教过我们英文戏剧课的余上沅推举给胡适主持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特别译书,经过译样审定,准予译我自己提出的斯特莱切(L. G. Strachey)现代传记文学名著《维多利亚女王传》,报酬较丰,这就成了我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

这种特约尤为难得的是:定了书,不管在什么地方译,按月预支一定数目的酬金,译完全书交稿清账。

我主编《水星》文学创作月刊6期为1卷,估计预支译书稿费数与译出字数比较,积欠太多,不得已把月刊编务也偏劳能干的靳以驾轻

就易,一个兼顾,自己就在1935年3月底去生活费比北平还便宜的日本京都(当时从天津去买船票就是,不需办签证手续),集中精力,闭门译书,进展顺利。我同时在那里还从容译了一些法国现代诗零篇,补译了纪德《浪子回家集》中的另几篇“解说”,西班牙阿索林的又一些小品零篇和小说章节。

当年夏天回国交特约书稿,北平此时已不仅是边城,“华北特殊化”,处境日益危殆。《文学季刊》和《水星》,不得不停办。由靳以到上海与巴金另办《文季月刊》(后又改刊《文丛》),我又只好应李广田约,去济南再教中学一年,1936年暑后才又获编译会特约译纪德长篇小说《赝币制造者》。我秋后在青岛海滨,住德国人办的休冬闲的避暑旅馆埋头两个月,每日10小时突击翻译,到年底译出了全书二十多万字,回北平交了稿(后在北平沦陷期间被编译会全部遗失),算了账,大有积余,足够我南返江浙,逍遥大半年,会友,写诗,自由译书。我在清明时节,在真如暨南大学宿舍借住,受李健吾怂恿,并提供法、英文原材料,一口气译出了法国贡思当(Benjamin Constant)的中篇小说《阿道尔夫》。暮春在杭州西湖陶社闲居,写诗之余,译了纪德《新的食粮》,夏天转去浙南海滨雁荡山才续为编译会特约译《赝币制造者》写作日记》和中篇小说《窄门》。基本上译完了,在山中得知“七七事变”爆发,平津沦陷,赶回到上海,已是“八·一三”以后三天了。和北平编译会觅取联系,接到了驻会秘书,也是特约译书,也是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生的一封信,说现在“树倒猢猻散矣”,我很不高兴听说“猢猻”二字,从谐音听起来太难堪,我是不甘自称胡适的徒子徒孙的,从此断了联系。从此不得不又去教书。

这次是应已经从北平流亡到成都在四川大学当文学院院长(?)的朱光潜约,去当讲师教大学一年级英文。我从1937年10月到1940年暑假,在成都和峨眉山的四川大学教了两学年。中间一年,计划去抗

战前方走一圈,1938年暑假随沙汀、何其芳去延安,在那里停留访问了两个月,另与吴伯箫等从南路过河转往晋东南和太行山内外访问、随军,次年春天再经延安按原计划回“西南大后方”,被盛情留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和严文井、天蓝一起,代从北路过河,也去了前方的沙汀、何其芳教课一期(约三个月)。暑后回到成都,大战也在欧洲爆发,外文系同事留我暂跟四川大学南迁峨眉山,我又在那里教了一学年。1940年暑后,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先再当讲师,教外文系四年英汉互译课,兼教各系一、二年级共修英文课两班,继在外文系先后开了两门选修课,1943年擢升副教授。抗战胜利前夕,经同事英籍作家白英(Robert Payne)推荐,1945年底得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驻重庆总代表处通知授予旅居研究员奖(Travelling fellowship),邀去牛津大学作客一年(当时给中国各大学各科同类名额每年5个),后因被邀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一名1946年期满适值病入医院滞留英国,推迟我此行一年。

在这期间,我从昆明街头美国大兵抛出的英文书中购得一本《时代》杂志,从中得知搁笔多年的英国小说家衣修午德(Christopher Isherwood)在美国新出版了一本走红的中篇小说《紫罗兰姑娘》(原名为《普莱台紫罗兰》——Prater Violet),又在《哈泼市场》(Harper's Bazaar)画刊上获得所刊小说原文,我读了很喜欢,一口气把它译出了,随即得知其中有删节,后在上海觅得原书,补译全了,发表前先将译者序,译成英文,寄定居在美国的笔者看了,博得嘉许,说是“如果译文和你的序文一样好,那么我不能再求更好了”。这是我事隔8年后第一次再译书。

我复员暂时北返天津南开大学外文系任教授一年。在滞沪途中,得巴金支持,在他主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交印我个人的译品丛刊,沿袭我的短作译品汇集《西窗集》的名字,取名《西窗小书》,即以《紫罗兰

姑娘》为第一种,其次是《浪子回家集》、《窄门》和《阿道尔夫》,到1948年陆续出版,原定第五种《新的食粮》未及编入重印,因为1947年暑假我就动身乘船去了英国。

我于9月底才到达牛津,与拜里奥学院(Balliol College)取得联系,作为它的教师席(high table)每星期一次晚餐的常客。在那里和校外结识了一些知名学者和作家,访问了莎士比亚故乡和以“湖畔诗人”得名的湖区,并没有做学问,只是全力加工我自己译改的长篇小说《山山水水》上编二卷的英文稿,仅应《人生与文学》(Life and Letters and London Mercury)杂志约译了我自己30年代写的两首短诗。一年期满,我未即回国,转去柯茨渥尔德(The Cotswolds)中世纪山村继改自己小说上编英文稿并进而开始译改下编。国内淮海战役打响,震动了英国,也使我从山中冬日浓雾中如梦初醒,立即搁笔(放下打字机),于12月下旬乘船出发回国,四星期后到香港,滞留等船北返期间把自己的小说译回了开头两章(原上编中文稿1947年留在国内,未带在身边)给《小说月刊》发表,3月中旬与戴望舒同搭挂巴拿马旗给解放区运纸的货轮抵达塘沽,未在天津停留,搭东北来的一列火车,被直接送到了北平。北京大学近水楼台,抢先把我拉去了它的西语系当教授,我又像20年前在那里听一年级英诗课一样,在所授英文组几门课当中就有一门给一、二年级开的英诗初步课。这次我不再像在1946~1947年在南开大学外文系就用现成的《英诗金库》敷衍作教本,改为从伊丽莎白时代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自己选诗,因与燕卜苏(William Empson)同事,也参考了他送我的现代诗选家波特拉尔夫妇(Magaret and Ronald Bottrall)编的一本英国诗选(1945年在瑞典出版的The Zephyr Book of English Verse)。20年前我从听讲《英诗金库》后随手试译去其中一部分,这次我每授一诗更事先差不多都认真先译成了中文。

这又回到译诗道路上来来了。50年代初我把原译的拜伦一些短诗和长诗片断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体诗7首修订了给《译文》杂志发表。1952年北京院系调整,我从北京大学西语系调到正开始举办的文学研究所当研究员,开始计划以“四大悲剧”为中心研究莎士比亚,写论文与专著,配以“四大悲剧”的诗体译本,这样,翻译上又回到了诗(素体诗与韵文)。1953年计划写的专著或系统论文集终未完成,凑编成的《莎士比亚悲剧论痕》一书,1989年底总算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先一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卷本《莎士比亚悲剧四种》(其中《哈姆雷特》译成于1953年底,1956年出过单行本,又重印二次,1958年,上海译制片厂曾据此整理为英国奥里维埃尔编导主演的著名影片《哈姆雷特》——改名《王子复仇记》——配音,“文化大革命”后又在电视上播映,获得成功),1982年修订、补订了几首英法现代诗,编成《英国诗选附法国现代诗12首》,于1983年出版于湖南人民出版社。《英国诗选》后交北京商务印书馆排印双语对照本,所译法国诗则单列处理。到此,我把一生的文学翻译行业基本收了摊子。

我说过自己习作文学翻译,并未遵循任何翻译理论指引,进一步,认为根本没有什么翻译理论好讲的,要讲也是讲不尽的。谁要是能掌握两个语种及其文化背景到一定的深度,就可以把文学作品翻译到一定的高度,只是文学翻译,也系文学创作一样,还要靠执笔者自己的能耐与辛勤决定产品的水平。

说来也怪,我先在西南联合大学,后又在北京大学,教过文学翻译课(英汉互译,以英译汉为主),只是我总是先在堂下仔细校改了同学交来的习题卷,加以比较,并以自己的想法增进综合的范例,谈谈问题。要说谈什么理论,我总是不赞同国内放论翻译问题者,众口一辞把严复的“信达雅”说当作天经地义,肆言“神似”“形似”的短长、争辩“直译”“意译”的取舍。我后来常说三种说法中都只有一字可取:就是

“信”，就是“似”，就是“译”。“信”就是全面忠于原文；神寓于形，文学翻译只能相应，“似”不能“即是”；翻译就是“译”，不该是“创作”。听说日本坪内逍遙译莎士比亚，结果比莎士比亚原著还好，要果真如此，那就是不忠于莎士比亚原著的本来面目，并不与之相应，可能是坪内的好作品、坏译品。我这些看法已多次见诸文字，例如：1983年据《译林》苏州会议上的发言写成的《文学翻译与语言感觉》一文（收入1984年江苏人民出版社编印的《翻译漫谈》一书）；1987年12月在香港举行的当代翻译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翻译对于现代中国诗的功过》（刊载1988年3月出版的香港《八方》文艺丛刊第8辑，1988年7月出版的台北《蓝星》诗刊第16号和1989年10月南京《译林》杂志第4期）也有较为集中的表达。要算讲理论，说不尽，就大致尽于此。

卞之琳

修订版译者引言

这本集子所收的原是我在 1930 年和 1934 年之间的零星译品。1934 年，承郑振铎约为他所主编的一套丛书凑一个译本，我就把自己的译品（不包括文学评论的译品）编理出一本小书，于当年 12 月完成，取名《西窗集》。稿本交出后不久，我自己就抱憾于取材芜杂，翻译草率，因为无法收回，就开始悄悄准备拆台工作；1936 年书出版后，我发现排印上又增添了问题，特别是韵文部分被书店编辑擅改分行，更令人啼笑皆非，只得积极进行另起炉灶的工作。

结果，集中最后一篇《浪子回家》和我后来译出的纪德另五篇“解说”一起，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照原著面貌，于 1937 年出了单行本《浪子回家》，1947 年重印，改名《浪子回家集》（作为《西窗小书》之一）；阿索林部分，另得了材料（罗大冈从法国寄来的一种法译本，萧乾的一位西班牙朋友寄赠的两本原著，戴望舒借给的一种英译本），加译了一些（部分核对了英法译文和西班牙原文，一篇承戴望舒用西班牙原文校订），1937 年扩充成《阿左林小集》，1943 年在重庆出版；福尔的《亨利第三》和里尔克的《旗手》（后者承冯至用德文原文校订）也于 1943 年在昆明合刊了一个单行本。

这本《西窗集》却在老一辈、同辈、年轻一辈的相识、不相识的读书

界朋友当中颇受注意,流传较广。到50年代后期,香港文学评论界也还有据我这个文本举例引证的;新近香港又翻印了这个废本行世。内地出版社本也曾建议重印它,我没有答应。现在看来自己报废也无用,我只能把书清理一番,踌躇再三后,决定拿出来印一个修订版。

清理措施是利用原先的一点拆台工作而进行重建。韵文这一辑抽出去另行处理。短篇小说,删去无大特色或与本集原作产生地域不相干的几篇。另一方面,替代《浪子回家》,换上了纪德长篇小说《赝币制造者》一章(这部小说在1936年底全部译完,抗战时期全稿丢失,只剩了以前在刊物上发表过的这一章)。福尔的《亨利第三》和里尔克的《旗手》归还建制;《阿索林小集》全部并入,成为主力。全书原来是以波德莱尔的作品来开场的,现在为了保持这个局面,就补进他的一篇散文短诗,放在头上。

这本集子原本不是一个时代、一种流派的欧美代表作家代表作品的全面、系统的选译本。当时只是为了练笔,为了遣怀,为了糊口,信手拈来,而一般又避免了已见别人译过的作品,现在还保持了漫不经心,随意摘拾的文学散步式本色。只是,经过这番整编,地域范围就单纯是西欧了(包括英国)。时代还是限于19世纪50年代末到20世纪20年代末,翻译时期延伸到了1937年。内容都是散文(包括散文诗)。文体流派大多是直接间接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有点血缘关系或者就是它的第一代。它们大部分不是写在20世纪20年代,但是以法国为中心的这一类作品,却正是西欧英美20年代所谓“高级”文学读书界的流行读物。从这个不求全面而随便选译的集子里也可以见出这种潮流的一斑。

这一本书的整理并不是用我今日的感观和趣味来替换过去那一路倾向。那已成历史,不容篡改。但是我现在补上和集子内容色调基本一致的波德莱尔的一篇散文短诗《时钟》(早先就曾试译过,没有拿

出来发表过,早已弃置,现在重新译出的)作为开篇,是有意使今日重印这本书多少另具了一点新的意味。这篇散文诗,在作者第一、二次发表的时候,还只是一篇抒情散文诗;到第三次发表,却在中间改换了一个短语,并在最后加上了一段结尾,也就使全篇成了一篇讽刺散文诗。我现在把它补在头上,也就有意不让玛拉美那两篇颓废、感伤、阴郁的散文诗好像带头为全书定调子。而用全书所收各家中最不知名的阿克雷芒的短篇小说《无话的戏剧》收尾,也是出于有意的安排。这篇短小、朴实,有传统小说的人物、情节,写得从容不迫,喜剧里也有悲剧的回味,全篇行文也有点散文诗的节奏。它多少也就代表我稍稍一扫我在这里所介绍的西欧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一种时髦,也算是“结束铅华”。

实际上,到今天,这些西方初期的所谓“现代主义”的,或和“现代主义”沾边或多少有血缘关系的 20 年代流行作品,本身也早已成古董了。我作为译者,即使在编纂这本译文集的当时,对于西方文学,个人兴趣也早从波德莱尔、玛拉美等转移到瓦雷里和里尔克等的晚期作品,从 1932 年翻译论魏尔伦和象征主义的文章转到 1934 年译 T·S·艾略特论传统的文章,也可见其中的变化。同时,我还开始接触到而注意了 30 年代初期艺术上多少有这些“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而在思想上却起了反响的文学作品。但是这本小书里所介绍的鳞爪对于我们今日的读书界大概还像是新花样。我们今日的外国文学爱好者,从欧洲 19 世纪的浪漫派诗和写实派小说一下子碰到西方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各种所谓“先锋派”作品,就有点晕头转向,恰就是因为漏掉了对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段西方文学的认识。

不言而喻,科技现代化,落后一年就是一大损失,但是文学创作上如果也有现代化问题,除了不知现状和不知过去同样是一种缺憾以外,衡量短长,却并不以年代差距、时尚差别来决定。依我的“保守”想